

南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刘景泉 总主编

走向世界的宝贵创获

——驻外使节与晚清社会变革研究

祖金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刘景泉 总主编

走向世界的宝贵创获

——驻外使节与晚清社会变革研究

祖金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世界的宝贵创获:驻外使节与晚清社会变革研究 /
祖金玉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310-03892-3

I. ①走… II. ①祖… III. ①外交人员—影响—社会
变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421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4.125 印张 4 插页 230 千字

定价:3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南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薛进文

副主任：陈 洪 逢锦聚 刘景泉 朱光磊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君潞	王新生	平章起	刘景泉	朱光磊
陈 洪	何自力	吴志成	张 静	李 毅
李维安	李翔海	周立群	武东生	赵铁锁
逢锦聚	高永久	阎孟伟	景维民	薛进文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驻外使节(专指常驻外国的公使,参赞、领事等外交官系列的成员不包括在内)是一个较早走向世界的新型群体,他们的主要贡献并不体现在外交活动中,而是体现在为国内的变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独特贡献。对此,学术界尚待引起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研究刚刚起步,成果寥寥无几。本书从驻外使节参与和推动晚清社会变革这一角度入手,在尽量广泛搜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专题研究为主、纵横结合的写作框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使节的贡献:

一、驻外使节参与和推动晚清政府主导的三次大的改革运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每一次运动中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迹。

二、受清政府委派,驻外使节为中国引进了先进的海军舰艇和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为海军海防建设提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建议,颇有实际应用价值,对晚清军事变革特别是海军海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驻外使节为国内的新式企业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机器设备,为各个领域引进了大量的外国专门人才。

四、驻外使节在晚清留学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留学生的派遣、管理,还是与学生所在国进行留学交涉,驻外使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的留学主张对清廷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在晚清民主化进程中,驻外使节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民主政体思想,而且在清末宪政改革中参与了建立民主政体的实践,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此外,本书还分析归纳了使节对国内变革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及其表现出的群体特征,同时提出了自己得到的两点启示。在不同阶段和领域中,驻外使节所处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变动状态。

他们之所以能为晚清社会变革作出多方面的独特贡献,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身份和走向世界的宝贵经历。他们的贡献表明,中国自身拥有进步的力量,能够对外来挑战作出正确的回应,能够吸纳世界上的优秀文明成果。当然,在近代以来国际性开放的形势下,必须与外部世界形成良性互动,才更有益于社会进步。

关键词：驻外使节 晚清社会变革 走向世界

前言

一、学术研究状况

晚清时期,西方炮舰轰开了长期闭锁的国门,从此,中国人开始带着复杂的思绪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驻外使节这一新群体,他们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力量。本书所说的驻外使节,专指常驻外国的公使^①,参赞、领事等外交官系列的成员不包括在内。终晚清之世,共派出 57 名驻外使节(不包括署理和未成行者),或专驻一国,或兼驻数国,共出驻 19 个国家。

对于驻外使节这一群体,以前有过一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某些使节的个体研究,二是关于早期使节群体的综合研究,三是关于后期使节群体与重大事件关系研究。

研究比较深入的使节个体主要是郭嵩焘、容闳、曾纪泽、薛福成、伍廷芳等著名人物,相关的专著和文章很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作品。

对郭嵩焘的研究,成果最丰富。专著主要有:《郭嵩焘先生年谱》(郭廷以编,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70 年版);《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黄显康著,香港中华书局 1987 年英文版);《郭嵩焘与道咸同光年代》(汪荣祖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3 年版);《郭嵩焘大传》(曾永玲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郭嵩焘评传》(王兴国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论文数量极多,笔者以为,以下几篇文章可为代表性成果:(1)沈云龙:《首任出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传记文学》(台湾)第 12 卷,第 1、2、3 期;(2)钟叔河:《论

^① 从晚清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派出的常驻使节都是公使,没有大使。

郭嵩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3)熊月之：《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4)田海林、宋淑玉：《郭嵩焘评议》，《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关于容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他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二是他历经洋务、维新、革命的与时俱进的人生轨迹。主要著作有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主要有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传记文学》(台湾)第16卷，第6期；李吉奎：《容闳与中国近代化》，《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罗福惠：《边缘人的报国心——容闳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对于曾纪泽的研究，成果也不少，有关其外交成就的占较大分量。专著主要有张立真的《曾纪泽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

关于薛福成的研究，涉及经济思想、外交成就、变法思想、侨务思想等很多方面，相关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主要有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伍廷芳是后期使节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关于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张云樵的《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张礼恒的《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对于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研究较深入。关于他在晚清的作为，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护侨等交涉活动和法律思想上。

除以上几人外，有关黎庶昌、张荫桓的论文也不少；关于许景澄、刘瑞芬、何如璋、陈兰彬等人，也有专文面世；对郑藻如、李凤苞等人，有的书籍中专节做过介绍^①。

与甲午战后派出的后期使节相比，早期使节中知名人物较多，留下的日记、文集等资料比较丰富，故研究成果较多。前面提到的研究成果较多的人物，除伍廷芳外，都是早期使节，这就为进行早期使节群体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到目前为止，关注早期使节研究的人还不多，仅有夏泉、林琼、笔者等极少人发表了10余篇文章做过初步探讨。这些论文是：夏泉的《晚清早期

^① 如欧阳跃峰《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岳麓书社2001年版。

驻外公使的爱国主义意识》(《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6期),《试论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0期);林琼的《甲午战前清政府驻外公使的选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甲午战前清政府驻外使节回国后的命运和结局》(《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清末早期驻外使节的国外交往与思想观念的转变》、《清末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文化的传输》、《清末早期驻外使节的西学实践》(三文分载于《广西民族学院》2000年第4、5、6期);笔者的《早期驻外使节对国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论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早期驻外使节与晚清侨务政策》(《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其特点》(《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6期)。吴宝晓则将早期驻英美外交官单独划出来,作为一个群体加以研究,写成了专著《初出国门:中国早期外交官在英国和美国的经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关于后期使节,研究的更少,集中在群体与重大事件关系上,代表作是郭双林的《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通过上述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把57名晚清驻外使节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现有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还相当薄弱,就笔者所见,还没有专著问世,而且论文数量也很有限。这种状况,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二、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我接触晚清驻外使节群体这个选题,要追溯到1998年,当时我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振江先生门下读研究生。在和陈先生商量硕士论文题目时,陈先生建议我做这个选题。查阅了相关资料,又考虑到自己的驾驭能力有限,同陈先生交流后,我决定缩小范围,仅做早期驻外使节(共22人)的群体研究,而且将角度定为早期使节与晚清社会变革的关系,重点论述早期使节对国内变革所做的贡献,题目就叫《早期驻外使节与晚清社会变革》。论文作出后,陈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并说这一题目很有潜力可挖,可做大做细。因此,研究生毕业后,我也比较留意这方面的研究,并将论文中的

部分内容整理成专文发表。三年后,2001年,我有幸重新回到陈先生门下继续学习,没有太多踌躇,与陈先生商量后,决定继续做晚清驻外使节这一题目,研究视角也沿袭硕士论文的思路,定位为群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了一定积淀,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驻外使节虽然是外交官身份,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并不体现在外交活动中,而是在于他们对国内变革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忽视的独特贡献。对于晚清驻外使节与国内社会变革这样一个有价值的题目,现有成果还很不足。夏泉和林琼偏重于研究使节的思想观念及其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郭双林撰写的《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和笔者的三篇文章对此有所触及,但还远远不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这更促使我下决心选择了这一课题。

除了学术考虑外,我也认为这一选题很有现实意义。诚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泛政治化,不能无原则地为现实服务,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果完全离开了现实,离开了政治,就会失去生命力。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期,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空前密切。历史上,因为没有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因而,当前,如何认清世界潮流,把握好这一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为此,回首走过的征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无疑是必要的。驻外使节是晚清官僚阶层中一个特殊的新型群体。独特的身份和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经历,使得他们具备了一定的世界意识,能够从世界的角度思考中国的问题,立足中国实际提出现代化主张,堪称晚清官僚阶层中最富新知识新思想的群体。他们是参与和推动晚清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闭关自守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对近代以来的开放型社会而言,走向世界有利于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成果,与国内现代化变革形成良性互动。这是本课题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宝贵启示,对今天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关系也不无借鉴意义。

三、基本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足够的资料是进行写作的首要条件。关于晚清驻外使节的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内容比较集中,就是使节个人的日记、文集

等,早期使节留下来的较多^①,而后期使节的很少;另一部分则比较分散,散落在各种档案资料汇编、报刊杂志、各种文集当中^②,搜集起来有些难度,需要认真爬梳整理。这些资料的存在,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可能。

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笔者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处理好使节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避免把个别人或少数人的观点和行为强行上升为群体的观点和行为,而要从群体性和共性着眼,主要关注具有政策保障或惯例支持的群体行为,以及以群体名义发表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掘出有代表性的个体观点,争取做到点和面相结合,个性和共性相辅相成。第二,采用以专题研究为主、纵横结合的文章框架。为了把更能体现使节共性特征的一些重要问题写得完整和深入,突出使节群体发挥作用的连贯性,本书主要采取按专题写作的方式,选取有典型意义的问题重点论述,尽量写得细致深入一些。从横向的时间段上看,驻外使节先后参与和推动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三次层级递进的改革运动,本书对此仅作粗略的叙述,以体现使节参与晚清变革的长期性,也使本书内容涵盖量更大,结构更合理。

本书的角度是驻外使节群体与晚清社会变革的关系,也就是使节对变革作出的贡献。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要论述了晚清遣使驻外的情况,并简略介绍了57名使节的出身和结局,将使节群体的整体面貌加以展示。第二章从横向时间段着眼,简要论述使节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贡献,展现出使节参与变革的长时段性。同时,归纳出使节对国内变革产生影响的几种方式。这一章是论述使节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总括性的一章。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则是选取了军事变革、引进机器设备和外国人才、留学教育、政治民主化四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以为,由于有政府的委派或征询作保障,使节在这四个领域的贡献很大,显现出比较鲜明的群体姿态和共性特征,故适合和值得做浓墨重彩的阐述。第七章则是带有结论性质的

① 如郭嵩焘主要有《郭嵩焘奏稿》、《郭嵩焘诗文集》、《郭嵩焘日记》等,曾纪泽主要有《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和《曾纪泽遗集》,薛福成主要有《出使英法比日记》和文集,容闳有《西学东渐记》,张荫桓有日记,黎庶昌有文集《拙尊园丛稿》和《西洋杂志》,刘锡鸿有《英轺私记》,何如璋有《使东述略》,陈兰彬有《使美纪略》,刘瑞芬有《刘中丞奏稿》和文集《养云山庄文集》,许景澄有《许文肃公遗集》,李凤苞有《使德日记》,洪钧有奏稿,崔国因有《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等等。

② 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东华录》、《清季外交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档案文献中,《东方杂志》、《时报》等报刊杂志中,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的文集中,都散落着不少资料。

一部分,笔者对使节在参与和推动晚清变革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色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得到的两点启示。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晚清驻外使节群体的研究上有较大突破。就笔者所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将57名晚清使节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文章或专著。笔者认为,驻外使节群体研究之所以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提起外交官,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折冲樽俎的外交活动,而在“弱国无外交”的晚清时期,驻外使节在这方面可圈可点的成绩并不多。其二,驻外使节群体人物很多(57人),相关资料分散庞杂,搜集起来有些困难。本书在尽量搜集梳理资料的基础上,选取了使节群体与晚清社会变革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为使节群体研究开辟出了一个较广阔的空间,作出了带有一定开拓性的初步探索。

第二,本书在尽量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使节作出贡献较大的四个方面,即促进以海军海防建设为主的军事变革、引进外国器物 and 人才、积极介入留学教育事业、推动政治民主化;而且通过资料表明,使节之所以在这四个方面颇有成绩,是因为有清政府的正式委派(如关于让使节购买武器,引进外国人才,管理留学生等,清政府都有过比较明确的规定),或者政府决策时特别重视征询和吸纳使节的意见(如关于清末宪政改革,关于留学政策等)。这样,将使节视为一个整体、论述使节群体的作用就具备了扎实的依据。这些内容很少有人做过专题论述。

第三,本书认为,驻外使节为晚清社会变革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拥有走向世界的宝贵经历和独特身份。有了这种经历和身份,他们才能形成开放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思想上产生飞跃,并作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实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与打破封闭、走向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晚清的开放总体上属于被动开放的范畴,社会各个层面渗透着封闭、停滞性因素,在这种大环境下,晚清每一个走向世界的举措都显得格外珍贵。而从世界发展的角度,近代以来,国际性开放、世界一体化已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每一个国家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适应和应对好这种世界大势。对外开放、走向世界与对内变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本书从这一角度对驻外使节与晚清社会变革的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现有成果中很少涉及的思维向度。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遣使及使节群体概况·····	(1)
第一节 遣使驻外情况概述·····	(1)
第二节 使节的选派与回国后的境遇·····	(10)
第二章 驻外使节与晚清社会变革总论·····	(32)
第一节 对洋务运动的贡献·····	(32)
第二节 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的动力·····	(50)
第三节 驻外使节对晚清社会变革的作用概述·····	(60)
第三章 驻外使节促进晚清军事变革·····	(68)
第一节 “坚船利炮”改变中国冷兵器时代·····	(68)
第二节 先进海防主张·····	(91)
第四章 驻外使节对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和人才的引进·····	(102)
第一节 国外先进机器设备的输入·····	(102)
第二节 外国人才的引进·····	(109)
第五章 驻外使节与晚清留学教育·····	(125)
第一节 留学生的派遣·····	(125)
第二节 留学生的管理·····	(132)
第三节 留学主张·····	(141)
第六章 驻外使节:政治民主化的推动者·····	(151)
第一节 早期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	(151)
第二节 清末宪政改革的推动者·····	(167)

第七章 驻外使节参与和推动晚清社会变革的特色及启示·····	(195)
第一节 特色分析·····	(195)
第二节 宝贵启示·····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5)

第一章 晚清遣使及使节群体概况

第一节 遣使驻外情况概述

互派常驻使节起源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第一个有记录可查的常设使团,是1455年米兰公爵斯福沙(Francesco Sforza)在热那亚设立的。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以后,欧洲各国普遍地互派了驻外使节,以保护本国及其国民的利益,增进彼此的了解,加强各方面联系。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外交人员的地位和规则通过国际协议正式建立。此后,互派常驻使节成为近代国际惯例的一部分。“每一个得到承认的独立国家,都有权派遣外交人员驻在其他国家,以代表本国的利益,同时,也应该接受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使节权已被普遍认为是主权的一个属性”^①。

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国古代虽然出现过张骞、班超、郑和等杰出的使节,却没有发展成为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常驻使节制度。中国处于另外一种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这种国际关系体系以东亚地区为主要地理依托,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理念,其主要特点是“朝贡制度”。到了明清,尤其是清代,这个体制更加完备起来。中国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妨碍了中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历朝统治者只知道有周边的朝贡国和藩属,而不知有与中国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反映在对外关系的建制上,就体现为只设礼部和理藩院^②,不设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只向朝贡国和藩属派遣钦差大臣

① [英]布恩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② 清王朝时期,礼部主管东边、东南边和南边各朝贡国(如朝鲜、缅甸、安南等国)的事务。理藩院主管北边和西边各藩属(如西藏、新疆、蒙古等地)的事务。

或接待来朝的贡使,而不与其他国家互换常任使节。朝贡制度是天朝至尊观念的产物,是封建社会内部尊卑等级在外交事务上的应用,它与建立在近代国际观念基础上的互派常驻使节制度格格不入。

一、遣使的背景

晚清时期,对外常驻使节的派遣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过程,它是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具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

列强的不断敦促是清政府遣使驻外的外部因素。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来华,第一次提出互派使节的要求,乾隆皇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辞一口回绝。鸦片战争后,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列强要求中国遣使的呼声更高。1858年和1860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有关遣使的条款,成为中外互派使节的最早“法定”依据。1861年至1862年间,英、法、俄、美等国相继在北京建立了常驻使馆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敦促清政府遣使驻外。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分别向清廷上《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鼓吹遣使的好处,向中国施加压力。赫德在提到中国应向外派遣使节时说:“派委大臣驻扎外国,与中国大有益处。在京所驻之大臣,若请办有理之事,中国自应照办。若请办无理之事,中国若无大臣驻其本国,难以不照办。”^①威妥玛措词比赫德更为激烈。文中大力敦劝中国派使驻外:遣使一事,“或问外国有何裨益?实无其益。若问中国有无益处?益实多焉”。具体而言,如果中国遣使驻外,当驻华外使有无理要求时,中国可绕过该使,通过驻外使节直接与派出国交涉,此为益处之一。西方国家素以互派使节为“来往之礼”,中国如遵循此礼,派出使节,就会被各国“联为居中”,而不是视为局外,从而改善中外关系,此为益处之二^②。这种议论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还译出亨利·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或译为《国际法要素》),供清政府参考。1871年,崇厚因天津教案赴法国道歉时,法国总统梯也尔也表示,希望中国派遣常驻使节^③。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卷40,第20页,总第3783—378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29—30页,总第3801—3803页。

③ 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32页。

互派使节本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常现象,然而,由于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和当政者的愚昧无知,直到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一直对之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在这种情势下,列强挟炮舰之威一再敦促中国遣使,虽确有侵犯之意和更牢固控制中国的图谋,但是,他们也因此向清廷灌输了一些近代外交知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促使中国开始走上文明之路。

说遣使出洋是西方列强的要求,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更大的动力来自清廷内部的洋务派。从1866年到1876年,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关于遣使驻外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开明务实官僚对遣使必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入,努力为遣使提供理论依据,同时进行了三次遣使尝试,成为清廷遣使驻外的内部动因。

第一次讨论发生在1866年,是由赫德和威妥玛的上书引发的。就遣使驻外问题发表意见的只有三位大吏,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江西巡抚刘坤一,浙江巡抚马新贻。崇厚表示赞成,刘、马二人则表示反对,反对遣使的意见占了上风,故朝廷未作出遣使表示。但仅仅一年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显著变化。

1867年,由于《天津条约》十年修约之期将近,掀起了关于遣使问题的第二次大讨论。有15位大员发表了意见,表示赞成的有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和湖广总督李鸿章等11人,占压倒优势。总理衙门明确表示,遣使一事,虽然存在经费和人才的困难,但“系必应举行之事”^①。

1874年至1875年间,日本侵台事件及筹议海防问题发生后,又掀起了讨论遣使问题的新高潮。1874年12月,李鸿章奏请遣使驻扎日本和西方国家^②。原来并不支持遣使的沈葆楨也在筹办东南海防的过程中转变了看法。福建巡抚王凯泰、两江总督李宗羲、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上奏请求遣使。其他中级官吏也纷纷建议遣使。1875年5月,总理衙门明确表示:“遣使一层,恐有难再缓之势。”^③清政府上下就派遣常驻使节一事达成了共识。

在对外观念上,洋务派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华夷偏见,认识到英法美等西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第26页,总第4898页。

② 《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70辑《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奏稿,卷24,第27页,总第835—836页。

③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折附单》,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